

§ 青年学者专栏 §

审美平等与当代批判理论中的康德美学批判

刘 晨

摘 要: 审美政治是当代批判理论思考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之一,包括审美平等、审美解放和审美共同体等具体问题。康德美学作为传统哲学美学的代表,在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暴露其限度。当代批判理论从康德美学出发,改造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审美平等的问题。朗西埃在感性平等的维度,将审美共通感阐释为自由运动的感性能力的普遍预设,让惯常感性分配体制下不可见的群体重新显现。巴迪欧聚焦主体平等问题,以康德不确定、无意义的超验理念,引导主体无限开放的思维能力,艺术主体以感觉方式的革新推动政治平等。阿甘本从生命平等出发,反思康德的先验演绎对人与非人之合法性形象的划分,将平等问题奠基于非人的生命感知活动。

关键词: 康德; 美学批判; 当代批判理论; 审美平等; 审美政治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24)04-0186-09

当代批判理论(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面对的现实语境是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体的情感、经验与感觉的全面渗透,审美政治学(aesthetic politics)是其分析和批判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阿多诺以“全面管理时代”指认社会生活领域的异化,个体被纳入社会集体化进程。及至当代社会权力逻辑的转换,单级权力中心分散于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经由对个体感觉、情感和身体的渗透维系政治活动。朗西埃、巴迪欧和阿甘本等人秉持实践介入的理论品格,在感性政治(sensibility politics)、生命政治(biopolitics)等问题下,将美学作为分析和批判社会现状的理论路径。康德美学作为哲学美学的重要代表,在先天认识能力层面将审美看作从日常生活中分化的情感能力。这致使美学研究囿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以认识论美学的形式存在,在回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遭遇困境。当代批判理论由此以康德美学的批判作为发展审美政治学的重要方式,通过改造康德美学,在感觉、经验及其意义的社会性机制上,推动美学与政治的融合。平等是当代批判理论审美政治学思考的具体问题之一,朗西埃、巴迪欧等人致力于在思维、认知和感觉能力上,使个体拥有打破不合理秩序,追求社会平等的批判能力。经由重新阐释康德美学与社会平等的关联,当代批判理论将平等问题指向个体感觉方式的变革。朗西埃、巴迪欧与阿甘本分别从感性平等(equality of sense)、主体平等(equality of subject)与生命平等(equality of life)三个角度,分析审美平等(aesthetic equality)的问题,为审美平等赋予具体的思考向度。

一、审美无概念与感性平等

对不平等社会现状的反思是布迪厄、利奥塔及至朗西埃等批判理论家秉持的理论诉求,他们关注底层、边缘与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致力于将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个体的感性经验层面予以分析和批判。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分化及其再生产是布迪厄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法国的文化及其教育系

作者简介: 刘晨,广西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南宁 530004),毕业论文获评2023年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批判理论的美学问题研究”(22BZW039)

统作为符号资本与权力隐秘媾和,参与了权力合法性的建构。而文化场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产阶级通过合法性符号系统的塑造,确立并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由此布迪厄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调查了社会实践中文化参与权力再生产的机制,即在饮食、服饰乃至审美等层面,呈现分层区隔的等级结构,标识不同群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差异。康德为审美判断确立的先验普遍性,被布迪厄以趣味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做出批判。康德在先验的反思判断力层面预设审美无概念、无目的的普遍必然性,即“一切人对于一个被看作某种无法指明的普遍规则之实例的判断加以赞同的必然性”。^①但布迪厄指出,所谓审美的普遍性忽略了审美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今天被规定为合法的艺术认识方式,即审美配置,也是历史的产物”。^②艺术只对掌握审美符号系统的群体产生意义。康德的审美判断在纯粹形式的鉴赏层面,以审美愉悦与感官快适、形式与内容的等级系统,区分了不同社会群体所处阶层的差异。

如果说布迪厄以趣味的区隔(distinction)原则,分析了康德美学在后工业社会文化符号的生产中起到的不平等作用,那么朗西埃则试图重新理解康德美学,指出其最终目的在于以先天共享的自由运动的感性能力,将社会平等的问题在每一个个体普遍的感性能力层面予以解释。作为经历法国五月风暴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朗西埃始终捍卫激进平等的理念,即每一个人在智力与感觉方面的绝对平等。“来自下层的思想”(thought from below)并不需要任何上位思想的启蒙,大众的困境不在于某种蒙昧的意识,而是特定话语体制以可见与不可见、可感与不可感的形式,遮蔽了底层大众自身意义的表达。^③“在柏拉图的思想里,灵魂的等级通过任务职能的分工而被合理化,而‘社会学’正是作为这种合理化出现的”,布迪厄对康德美学的反思仍会陷入柏拉图式的元政治。^④习性(habitus)作为不同群体持有的客观的性情倾向特征,是结构化、稳定化的生活形式及其意义原则,只能被还原为个体拥有的权力资本及其在场域中所处的存在位置。从柏拉图对理性与欲望做出区分,将理性评判为灵魂中较好的部分用来构建理想国的等级秩序,到布迪厄以上流阶级与大众阶级、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分析社会的不平等分化,两者均囿于元政治,以某种合法性认知秩序预先划分和排斥部分群体的感性经验,这使得个体的一切感觉、经验及其意义,只能循环于不平等的感性体制。

但朗西埃认为平等需要被理解为歧义纷呈的无秩序形式,以此打破一切话语体制的预设和划分。美学与平等的扭结即在于如何让被统治者的话语、声音和感觉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重新可见、可听与可感。朗西埃指出了康德美学孕育的平等向度。康德对规定性判断与反思性判断、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揭示了抽象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度,时空的直观形式作为划分合法与不合法、可见与不可见边界的基础,以统一的概念范畴规定并过滤杂多的经验现象。但知性统摄经验表象的客观原则,使大量的表象被知性以知识的普遍性予以划分和舍弃。审美作为特定的情感能力,其根源在于知性难以认识自然丰富庞杂的经验性规律,为认识无限多样与特殊的经验表象,需要无概念、无目的的审美判断假定主体具有容纳差异与特殊的能力。而审美经验打破合法与不合法的感性体制的划分,则缘于其判断形式并非逻辑判断,即不是以实在性概念预先区分和排斥某些经验内容,而是作为单一偶然的主观判断,回溯于个体当下亲历的情感状态,亦即“不是建立在概念上,而只是建立在情感上”,这使主体与对象的逻辑判断关系转化为自由运动的情感关系,脱离概念范畴的划分。^⑤正是这种区别于知性能力的主观无概念的感性能力,为个体平等赋予先验的承诺。

审美作为从先验层面奠定社会平等的感性根基,不在于附庸当下社会现实中结构化的感性秩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② 皮埃尔·布迪厄《区隔: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页。

③ 让-菲利普·德兰蒂编《朗西埃:关键概念》,李三达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④ 雅克·朗西埃《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蒋海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1页。

⑤ 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6页。

序,而是需要被理解为不同个体先天共享的自由运动的感觉方式。布迪厄以社会学实证调查的经验研究法,批判康德美学作为“符号暴力”,以无目的、无概念的审美契机,将美学窄化为判断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认知模式。但朗西埃认为康德美学的平等契机在于先验地肯定无概念、无目的的感性能力,使个体可以溢出感性分配的等级秩序,自由感受并理解当下的生活形式。他指出“康德要说的,其实连小学生都明白,但等人们受到再现式传统观念的无形影响,就很容易忘记这一点:美给人愉悦并不需概念。”^① 审美主观合目的性的原则作为平等的先验根据,存在于每一个体的情感活动中,它使不同阶层的个体都可以溢出感觉的特定分配,在普遍人性的角度确立一种歧感(dissensus)能力的平等。

朗西埃认为政治包含两种思考原则,即审美原则与伦理原则。^②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公民的灵魂按照金银铜铁四种等级划分,不同等级服从严格对应的感官经验与行为模式,以此让城邦公民各居其位,构建理想的伦理生活。但这种伦理原则“将为人们量身定做的某个位置、某种职业,以及某种天资才能,即一种感性的装配”。^③ 布迪厄囿于社会科学实证经验的调查,认为“康德的美学,或者在低层次上,他的‘权力冲突’理论”,只是艺术场中话语权力的争夺。^④ 但朗西埃发掘康德美学的先验向度,指出平等不能止步于当下现实经验所遵循的再现性逻辑,否则只能成为对柏拉图元政治的还原,而是要在先验维度肯定审美作为感觉方式革新的必然条件。康德以先验演绎的形式,指出存在关乎愉快和不愉快之情感能力的审美领域,其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原则,触及了知性难以规定的丰富庞杂的经验性规律。正是通过这种多样特殊的审美感性,我们能通达不包含区隔、排斥与划分的社会形态,平等容纳每一个体自然生长的经验。

对不平等社会等级的废除是亲历五月风暴运动的思想家共同思考的问题,利奥塔将现代性知识的解构与政治权力批判结合,以歧争强调不同个体话语实践的纯粹异质性与不可通约性,朗西埃接续这种对共识政治或元叙事的批判,以歧义呼唤政治异质性的意义生成逻辑,强调政治主体溢出治安(police)分配秩序的错位。两者在此问题上都试图以差异特殊、生成涌动的审美感性思考政治问题,打破不平等的意义再现机制。有学者指出“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与朗西埃期望以经验超越艺术世界的边界,正如它超越人类自身的条件限制,表达无限的本体论和政治维度的可能。”^⑤ 利奥塔认为面对后现代以来宏大叙事的消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理解个体意义的方式,让曾经被总体性叙事所压制的不可再现者显现。他回归康德美学,以崇高“记录感性的冲击并且证明原始的差距”,溢出总体性形式的捕捉。^⑥ 朗西埃部分赞同利奥塔,同样以审美判断的无概念性,指出个体溢出规定性可感性形式的力量。但朗西埃不认同利奥塔将平等安放于纯粹脱离形式的生命感知,后者并未赋予个体之间经验平等并置的可能,而转向对另一种遥远神秘的超感性经验的膜拜。

尽管利奥塔意识到审美唤起的感性经验是承载生命个体之差异性,颠覆统一的再现秩序的重要基石,正如他以后现代艺术的崇高去触及脱离总体性概念的不可再现经验,指出崇高就是想象力突破概

① 雅克·朗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赵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页。

② 布迪厄曾在《社会学的问题》中对“ethos”“habitus”做了具体的界定和分析。“ethos”指“一套客观的、系统性的、具有道德维度的性情倾向,一套实践原则(伦理是一个有意识地保持连贯的、有着明确原则的系统)”。它是在行为实践中形成并内化于身体的生活方式,与规范化的道德原则有所区别。参见布迪厄《社会学的问题》,曹金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78页。朗西埃的伦理原则在此意义上延续布迪厄的理解,“我们已经说过,民主并非人们的习性(ethos),并不是人们‘存在的方式’给个人带来民主,而是此习性的断裂,介于言说存有的能力与行为,以及存有和言说的任何‘伦理性’和谐之间所经验的间距就是民主”。参见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③ 雅克·朗西埃《审美维度:美学、政治、知识》,谢卓婷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

⑤ Stephen Zepke, *Sublime Art: Towards an Aesthetics of the Fu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2.

⑥ 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念形式划定的边界后个体感觉的“越界”(excess)。但朗西埃认为,“在利奥塔的作品中,这种次级确定—这种从可见物到可说物的松散关系—达到了一种极限”。^①平等需要以无概念的审美感性悬置既有认识形式的规定,但个体经验感受的形成同样以当下的可感性形式为基础,我们难以设想绝对无形式、从未经历甚至不可理解的他者经验。这正是朗西埃选取康德的审美判断而非崇高,去思考平等问题的原因。康德认为作为主体从自然走向自由的桥梁,正是自然界存在的诸多经验性规律,即审美表象,只有以它作为契机,我们才能思考完全与表象形式相切割的自由理念。也就是说审美感性的运动需要以当下可经验、可感觉的自然领域为基础,否则我们难以直接越过惯常的表象世界,去思考不可感、不可经验的自在世界。朗西埃以合目的性的审美表象思考平等,而非如利奥塔将平等奠定于想象力与知性不可和谐之后的,绝对混乱、碎片与差异的崇高。正是崇高以“非人”(inhuman)的形式,撕裂了生命长此以往、稳定整一的生活语境,使个体只能迷失于不可理解的超感性运动。

朗西埃直面后现代思潮对他者、非人与解构等伦理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歧感源于当下可感性体制的扰动,而非如后现代思想家形式所构想,源于失去一切稳定意义指向的去中心化的感觉运动。平等是当下可感性体制裂隙之处的增补(supplement),而不在于消解总体性概念后,走向另一种永恒生成的非人经验。如果说在利奥塔看来任何将生命置于某种中心秩序之下的思考,都会导致对不可再现者的遮蔽,平等只能安放在非逻辑、去中心的差异化感知上,以此让个体挣脱任何再现结构的束缚,那么“在康德那里,感觉力没有和崇高一起消失,而是成为一种不在的感觉力”。^②朗西埃认为“这种观念证明了人类心灵自古以来就依赖于无法把握的当下,和拉康一样,利奥塔将这个当下称之为‘大事物’”。^③我们难以去理解从未经历、疏离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他者。感性平等在于让个体的经验从当下的可感性配置之上重新流动,让每一个体平等编织并理解自身的生命意义,赋予个体扰动既有政治共识的实际可能。

二、认识主体与主体平等

反思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巴迪欧与朗西埃共同的理论语境,他们反对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划分,这种理论范式某种程度秉持与传统政治哲学相似的逻辑,即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真理与意见的二元对立,通过某种连贯统一的知识结构,划分了意义与无意义的边界,使社会群体被分层的社会等级秩序区分。两人认为任何自治统一的政治哲学观念,都以合法性体制遮蔽和消解了现实存在本身的多样与异质,因而正如巴迪欧所说“无论对我还是对朗西埃,主张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中去建立平等的现实。”^④朗西埃与巴迪欧反对任何知识权威建构的社会秩序,试图发掘被同一性情境结构或“治安”所遮蔽的非实存元素或“无分之分”者,让惯常意义再现机制中不可感、不可说的存在显现。巴迪欧认为当代哲学的使命,就是作为发掘溢出当下有限经验情境的无限事件,辨识难以被既有表象结构所囊括的非实存要素。哲学通过对降临的真理事件的回应,恢复人与无限多元的对象世界的关系,打破有限性思维边界划定的认识形式。由此巴迪欧以无限性哲学批判康德的认识主体,将哲学问题在主体认知边界的改造与拓展上,转换为不可辨识的无限(infinite)思维能力突破有限(finite)经验表象,让被遮蔽的存在之纯多(pure multiplicity)被发现的平等问题。

巴迪欧认为不平等需要回溯于计数为一的再现机制的先天根源,即康德在知识的合法性层面先验演绎的认识模式。纯粹之多的要素作为无限多元的存在,超验溢出当下经验情境的规定,

① 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第173页。

②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1页。

③ 雅克·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蓝江、李三达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④ 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蓝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是不可规定的剩余物,而当下经验情境再现的不平等植根于主体与客体、观念与对象的同一性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和一致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有自己的惯习和参照系;在这个世界里,存在最终会因为实在而被囚禁”。^① 同一性表象世界确立的先天根据可以追溯到康德所面对的先天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如何重建主体与客体之间认识普遍性的问题。正是知性能力以概念范畴将杂多偶然的感性表象,综合统一于先天普遍的有限性机制,导致主体的认识循环于既定的概念边界。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知识可能的根据源于规定杂多经验表象的知性能力,即“我们具有某些先天知识,甚至普通知性也从来不缺少它们”,形而上学知识是主体将杂多的偶然表象综合统一的知性能力。^② 只有从先天知性的角度,规定经验判断主观有效,将杂多的表象碎片综合联结于概念逻辑规定的可能性中,我们才能赋予知识以客观有效性。巴迪欧则指出生产这种先天知识的知性,其运行机制恰恰产生并维系着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使无限多元的存在收缩于某种有限同一的认知规则内。

不平等需要在有限性认知能力的层面被理解,并非单纯是某种特殊的情境秩序,而是个体何以自发接受这种有限封闭的经验区分机制。这实际始于先验统觉所导致的主体认知能力的退化,统觉作为有限性存在的根源,先验肯定人必然具备综合统一的认知机制,主体需要按照普遍明晰的分类原则,将无限延展的存在纳入某种计数机制中。计数机制的根源不在于以何种范畴构成当下情境的认知规则,“存在的是纯粹的束缚性能力,……是‘把多重给定的表象置于统觉的统一之下’的能力”。^③ 统觉的不平等需要追溯知识生产的合法性依据,即康德为确立先天知识,先验赋予主体的综合统一的认知机制。这种知识生产的思维模式,导致主体认知的封闭和退化,忽略特定情境表象之外无限多元的异质性要素。哲学的功能不是作为某种普遍统一的知识原则,为人与世界的关系设置严格的界限,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收缩于固化、机械的认识论框架内,而是去发掘原先情境结构所忽略的元素,推动主体去行动和发现意义空无之处那些不可再现的类性存在。由此平等问题进一步指向主体延展并命名类性(generic)存在的能力的退化,只能沦为依附于所属情势状态的有限的实存。类性即对世界原初无限之多的存在方式的描述,每一类性存在都具有平等溢出当下情境再现规则的能力。这种对人之存在溢出一切经验分类的类性的肯定,以无限性主体的形式构成政治平等的超验“公设”。

真正的政治平等即认识、理解乃至再现非实存之物,让原初的多元存在平等共存,艺术作为不可辨识的感性事件(event),以感觉形式的创造与突破,构成政治平等的超验“公设”之一。在巴迪欧看来,艺术尽管作为汇聚感觉要素的真理程序,并非等同于政治平等,但以颠覆性的感觉活动溢出既有可感形式,在主体思考无限性存在的角度,构成平等的感性契机。康德的审美判断因为在人与对象之间建立和谐统一的原则,将个体封存于有限性思维的框架内,导致了诸存在物显现的不平等。尽管反思判断区别于以普遍原则规定特殊对象的规定判断,是对自然界中诸多不可规定的经验表象的主观反思,但康德仍认为审美判断基于愉快和不愉快情感能力的先天原则,即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使想象力通过一个表象而实现与知性能力的和谐。即如其言“这种美的观念在实质上是我们的感官感受同知识分子的表达之间的调和。”^④ 这种将艺术归结为美之观念的哲学表达,将不可区分与规定的艺术事件窄化为某种主客体之间的认识模式,使艺术沦为对现存意识形态的巩固,被缝合于有限的思维体系内。

艺术作为真理的类性程序之一,其平等契机需要在空无与剩余的感性事件中被思考,它是主体对

① Alain Badiou, *Theoretical Writings*, trans.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170.

②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③ Badiou, *Theoretical Writing*, p. 136.

④ 阿兰·巴迪欧 《世纪》,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绝对异质的感性新质的艰难探索。巴迪欧与朗西埃共同忠于1968年五月风暴传达的平等理念,如何在政治哲学观念预设的等级秩序之外,让边缘、非实存的群体显现,构成两者的理论诉求。他们都指出艺术的平等潜能存在于不可划分与规定的感觉中,但两者对平等的实践效果及其通达路径却有较大差异。朗西埃认为巴迪欧区分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无知,将政治以“不朽的观念凌驾在一切感性的和可朽的东西之上”,这使一切个体的思想与经验都在真理事件的降临中被划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①但巴迪欧认为对存在之多的反思,需要在极其匮乏的事件维度上被理解,而非在当下可感性体制中思考歧感的扰动。后现代社会对偶然、碎片和去中心化的差异性政治的追逐,最终让个体停留于性别、族裔等多元身份认同所编织的平等主义幻相。朗西埃的歧感仍停留于差异性政治的限度,并未脱离有限“政制”(the political)的预设。他让无数个体在混乱、碎片与去中心的运动中,远离了大写的真理,依附于琐碎庸常的经验事实中多元文化身份的认同,一切个体的认知和行动都在虚假多元的身份政治中被分类。而理想社会形态需要康德式的超验理念,作为大写的无限性理念,去引导不同主体,直面现实生活中偶然闪现,越出经验界限的事件,否则一切个体意义的创造,就仍局限于权力所预制的有限性集合的分类机制内。

对哲学与平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两者对康德美学的平等性做出不同的阐释。朗西埃的感性平等基于审美共通感的先验预设,这使个体即使在庸常的表象世界,也拥有与当下可感性形式自由运动的能力。但巴迪欧认为这仍是将存在的多收缩于情境结构预设的虚假多样性中,导致艺术退化为对当下体制的确认。巴迪欧之所以否定朗西埃,在于他认为康德尽管将审美判断区别于逻辑判断,但其根源仍然以和谐统一的先验原则,将艺术还原为人与表象世界之间的某种稳定、和谐且连续的亲和关系。而艺术导向平等的契机,需要上升到事件层次对空无、匮乏与非人存在的理解。巴迪欧赞同康德对超验理念与先验知性的区分,先验知性作为囿于当下现实表象的有限计数结构,难以思考对象无限多元的存在形式,只有在超验、抽象乃至神秘的事件维度,我们才能在经验表象之外肯定另一种突破感觉极限的审美活动的可能性,去直面当下可感性形式完全不可容纳的部分。正是现实情境中那些非实存的感性事件才捍卫了个体存在多元异质的权利,而康德美学始终从认识论的有限视角出发,将审美窄化为某种人与经验世界和谐统一的有限关系。

朗西埃与巴迪欧对康德美学的理解,折射出感性平等与主体平等在实践有效性上的差异,前者认为康德审美判断的平等承诺,是贴近已有感性分配体制之上的增补,以此肯定每一个体重新理解生活的最大普遍性,“也就是对于一种属于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能力的肯定”。^②朗西埃反对将绝对空无的无限性观念赋予艺术,因为这种不可理解的神秘真理会重新将个体引入对某种超感性大写观念的膜拜。巴迪欧则在审美平等的超验预设上,指出我们必须脱离朗西埃在艺术的审美体制与再现体制间建立的暧昧不清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只能使感性循环于可感性体制允许的艺术实践。美学之政治介入的有效源于少部分艺术主体极端的创造,只有如此才能唤起非实存与不可感的感性事件。巴迪欧批判朗西埃的感性平等所秉持的平民性立场。朗西埃试图以共通感先验肯定每一个体拥有识别不同艺术现象的能力,将歧感回归庸常稳定的日常生活,而巴迪欧则以无限性观念与有限性观念的对立,指出这种平等只是另一次对当下经验的复归,将艺术事件蕴藏的平等契机转换为所有人都可接受并理解的平等幻象,因为“感性来自永恒真理的构建过程,它超越了个体的实体性和集体的修辞学”。^③平等的关键不在于贴合当下共享的感性秩序,这只能使无限的感性真理被迫贴合大众惯常熟悉的分类秩序,“可能会有蛊惑人心的诗歌,认为它能触及所有人,因为它只是借用时下的观点,……这些贫困的形象定

① 雅克·朗西埃 《美学中的不满》,第81-82页。

② 贾克·洪席耶 《感性配享:美学与政治》,杨成瀚、关秀惠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21年,第8页。

③ 阿兰·巴迪欧 《柏拉图的理想国》,曹丹红、胡蝶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义了人们如何与其环境一致”。^① 美学只有在事件维度,去直面转瞬即逝、不可理解的感性之新质,才能脱离当下情境预设的边界,以激进批判的姿态,开启主体对现实的反思。

三、先验演绎与生命平等

生命政治的权力逻辑基于一种合法性生命形象的先验演绎。至高主权(sov^{er}eign power)与赤裸生命(bare life)的二元结构不断以例外状态的形式,排斥并驱逐部分不合法的个体生命。但生命权力何以划分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界,在例外状态中自由决断和排列生命的价值等级,这是基于人与非人的二元结构的划分。通过在保护生命为标准的共同体内部,演绎合法性生命形象,至高主权不断借由培育生命的名义,将部分非人、不合法生命存在排斥于共同体的边界外。康德的理性认识哲学在此构成生命权力运行的底层依据,他对主体认识能力之合法性的先验演绎,构成生命权力常态化运转的地基,正是先验的认知原则将个体生命形式(form of life)预置和捕获。康德为确立形而上学知识之源泉的普遍有效性,指出知识以先天普遍的形式产生于纯粹理性的能力,排斥偶然性经验的主观联想,“正是在这样一些超出感官世界之外的知识里,在经验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线索、更不能给予校正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理性所从事的研究”。^② 康德规定纯粹理性能力本身的原则、范围与边界,从形而上学知识的维度演绎主体认识的先天根源。而这种从认识之合法性边界的角度规定生命存在的批判哲学,使得普遍必然的认识原则参与了人与非人之边界的划分与生产。

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的死亡暴力发端于理性认识原则,经由某种认识原则的演绎,合法性知识在生命共同体内部转化为生产合法性生命的“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人只有在何为入、何为动物的分类等级机制中,才能将自己区别于次级的动物生命。康德对知识之源泉的演绎推动了这种“人类学机器”的形成,其根源在于知识的形成,必然需要划定实在性边界、原则和范围,区分偶然的经验、感觉与表象,而正是对特殊经验的划分与排斥,塑造了理性主体的客观必然性地位。康德的纯粹理性知识以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将个体构建并塑造自身生命形式的权利,交付于先验的理性原则,致使人与非人的生命边界不再是人与动物的划分,而恰恰是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从人类群体内部划分了等级标准。“一个‘原型’,康德补充说,‘唯当它遥不可及的时候才保持如此。它必定只充当准绳’”。^③ 在康德看来,经验表象的联结只有被先验原则予以综合统一,才能作为真知。在此意义上,“人类学机器”生产的生命形象,正是通过对个体认知原则与行为模式的合法性演绎,完成了对人类内部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等级划分。

理性认识原则对经验的抽象与分割,导致不可判断与认识的生命存在退化为可判断、可弃置的赤裸生命,其根源在于理性原则对杂多的经验表象的征用与弃置。实际上福柯在思考知识、话语与主体的同一性关系时,已经认识到康德塑造的主体认识范式与生命权力的媾和关系,如他说“为了彻底摆脱主体,一个人不得不在历史的网络中说明主体的构成。”^④ 康德从知、情、意三个领域确立人类作为主体存在的最终目的,使每一个体自发嵌入权力预置的主体形象。由此阿甘本提出“人类学机器”塑造生命形象的条件,即先验认识原则的绝对明证性对个体经验的遮蔽。康德对经验认识之边界和原则的划定,以哲学人类学的方式,为生命权力对个体身体与思想的规训提供了一套合法的知识话语。阿甘本进一步认为康德先验主体导致的不平等,不在于某种现代主体认识结构的塑造,而在于先验理性认识原则剥离了生命经验的潜能(potential)。权力不断划分人与非人、政治生命与赤裸生

① Alain Badiou, *Handbook of Inaesthetics*, trans. Alberto Toscan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

②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 5 页。

③ 吉奥乔·阿甘本 《万物的签名》,尉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1 页。

④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04 页。

命的不平等边界,但问题在于为何个体会自发嵌入这种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亦即“个体们自愿被奴役与客观性权力之间的触碰点是什么?”^① 权力之所以不断完成对部分生命存在的否定性判断,其核心依据在于生命经验丧失了潜在性维度。康德的先验认识并非如福柯所分析的,指向了主体形象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其深层原因是先验演绎的认识形式对个体感知能力的压缩。正是这种先验形式让个体亲历和感受的生活逐渐僵化并枯萎,导致生命形式的意义让渡于已然预置的实在性框架,权力由此完成对个体的经验、身体与意义的赤裸化改造。

如果说人与非人、政治生命与赤裸生命的不平等,在感知与意义的维度回溯于权力对生命形式的填充,合法性生命形象的建构基于对个体特殊性经验的筛选和判断。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让生命意义否弃任何实在性概念、属性与内容的规定,重返人与动物、人与非人无区分的潜在性状态,以此抵御权力的划分。阿甘本部分赞同康德的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其作为个体生命形式的自由基石,脱离自然因果性概念,使生命在贴近既有生活形式的同时,将实在性生命形象消解为不可表征与再现的无意义状态,即溢出生命形象之后的非人生命。康德在区分自然与自由时,已经意识到个体行为意志的自由与经验表象的必然之间的悖论,即存在于自然表象的认识主体受必然法则的支配,而如何让主体跳脱因果序列规定的自然世界,走向理性存在者的自由,只有后者才赋予个体基于当下表象世界自由选择与行动的可能。“那么一个这样的意志就必须被思考为完全独立于现象的自然规律,也就是独立于因果性法则”。^② 由此平等的保障并不在于某种合法性生命形象,而需要将生命放逐于一片匮乏、无意义的非人领域。

阿甘本与德勒兹共同秉持对启蒙运动以来这种人文主义形象的否定,以非人生命反对康德理性主体的先验演绎。福柯认为康德的主体是现代权力中的有限性“知识型”范式,德勒兹更是在“动物-生成”的维度,以感知永恒的穷竭,将现实生活中主体的经验结构与意义网络分解为纯粹无意义的感觉颗粒。阿甘本部分接受两者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立场,三者共同反对康德从主体认知的先验原则上,以理性的边界、范围和条件演绎生命的意义空间。但生命平等的捍卫不在于将生命朝向无法命名、不可理解的超感性生命,这种不可理解的非人形象导致生命丧失了向生活敞开(open)的能力,而是需要重新恢复生命与生活之间可言说、可交流的经验。德勒兹将康德的想象力阐释为脱离认识职能束缚的感知力,以审美判断中诸职能的自由运动关系,思考无特定领域、范畴和对象的生命感知状态。阿甘本同样认为这种无任何经验羁绊的纯粹生命(pure life),以绝对超越的感知运动将个体根植的生活语境消解,在其中只能剩下绝对虚无与匮乏的生命存在。

德勒兹与福柯以非人的超越性感知,让生命不断突破当下社会秩序规训与辖制的领域,以此反对康德先验理性主体塑造的人的形象,但两者对感知永恒生成与差异的强调,让生命的意义远离日常经验的地平线,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封闭了生命潜能。“这一幻象,确切地说,也是某种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必然幻象的东西,它是内在性本身自行生产的”。^③ 德勒兹与康德实际以不同的方式,各自走向理解生命意义的共同终点,即生命自身空无、匮乏后的非人状态。康德为溢出表象世界的认识逻辑链条,将纯粹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置于不可经验与认识的“普遍立法的单纯形式”,德勒兹则将生命理解为永不停歇地创造生成的自由欲力。两者都将生命感知置于一个不可经验与理解的超验领域,在这块绝对空白的地带,生命存在降格为绝对无知和无意义的动物或非人,“它不再是人,因为它已经完全遗忘了所有理性元素”。^④ 但我们如何去设想超越一切意义网络与生活形式的感知活动,去生成绝对

①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②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③ 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王立秋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416页。

④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 99.

孤立的生命形象。如果德勒兹以非人的生命,已经指出康德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的话语对差异性生命的挤压,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重建新的生命形象,防止生命在后现代解构一切中心和总体性概念的思潮后,倒退回人与动物无区分的非人状态。生命平等基于生命自主言说、感觉并赋予自身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敞开性的生命存在,在人与生活形式自由言说的活动中,让生命重新勘定人与世界的关系。既有的生命形式并未被清除,而是以自由敞开的方式,切断目的与手段的机械链条,在生命与生活形式彼此的自由嬉戏中,让意义不断涌现。正是这种生命自我敞开、层叠涌动的经验,在后现代反人文主义的语境下,构成防止人降格为非人和动物的根本保障。

四、结 语

当代批判理论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将平等问题回溯于个体自我生成的感觉。审美以自由运动的感觉方式,打破日常经验分类的等级秩序,承载社会平等的政治潜能。朗西埃在感性平等的维度上,以个体的歧感能力,打破可感与不可感的感性分配。巴迪欧从类性主体、政治主体及至艺术主体,将平等放置于主体思维能力的无限性可能。阿甘本在生命平等的维度,打破人与非人之合法性边界,将生命意义回溯于非人的感知状态。当代批判理论经由对康德美学的改造,在传统认识论美学之外开启了一种行动介入的审美政治学,其始终以实际具体的问题为引导,赋予审美批判现实的实践品格。康德等传统美学止步于形而上的哲学批判,忽略了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朗西埃、巴迪欧等人以感觉及其意义的社会生成视角,逐步解决这种美学理论的局限,将美学问题回归特定社会空间内不同个体如何感觉、如何经验的政治伦理问题,拓展了美学学科的阐释效力和问题视域。审美与政治的融合是当代美学的重要问题域,包含多条理论进路的推动。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学根植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在学理层面旁及美学在问题、方法与范式的转换,在感性与政治关系的条件机制上,越过哲学美学包罗万象的理论话语,与多重社会议题交叉,构成当下美学研究的最新生长点。

(责任编辑:郭鹏程)

Aesthetic Equality and Kantian Aesthetic Criticism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Liu Chen

Summary: From Baumgarten to Kant, aesthet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whose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limited by abstract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real life.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ractice,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ha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explaining, interven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real life. The aesthetic research may need to change at present, by returning to the sensible scene of individual daily life, and explaining the various aesthetic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constantly emer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tur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the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ists such as Renciere, Badiou and Agamben insist on the theoretical tendency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oppose the static unified perspective of Kant's aesthetics, which prescribes social life and narrates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aesthetics regression. They try to analyze specif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with aesthetics close to the living social context. By criticizing Kantian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promotes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and develops a kind of aesthetic politics, which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social problems in three forms, namely, sensible politics, event aesthetics and biopolitics, from the level of sensibility, emotion and feeling, and endows aesthetic practice with theoretical character. Aesthetic politics i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s it has established the thinking mode of equality, liberation and community. By breaking the homogenous structure of daily experience, aesthetics overflows the cognitive principle of inequality and constitutes the aesthetic logic of political equality, and the issue of equality is reposed in the sense of individual free generation and creation.

Renciere, Badiou and Agamben think about aesthetic equality by equality of sense, equality of subject and equality of life. In the equality of sense, Renciere interprets the aesthetic common sense as the universal presupposition of the sensitive capacity of free movement that represents the invisible groups under the conventional sensibl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heterogeneity and coexistence. Badiou focuses on the equality of subject, using Kant's uncertain and meaningless transcendental idea to guide the subject's infinite open thinking ability to transcend the limited and closed experienc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nfinite ability constitutes the root of equality. The subject of art promotes political equalit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the way of sense. Starting from the equality of life, Agamben reflects on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legal image of human and inhuman. The problem of equality is based on the inhuman perception of life, placing the meaning of life in an undistinguishable void area, returning to the open state of life, and dispelling the unequal boundary between human and inhu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ntian aesthetics by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space and interpretive effect of aesthetic research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makes a new kind of critical aesthetics possible.

Key words: Kant; Aesthetic criticism;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esthetic equality; Aesthetic politics

From Literary Incidents to Research Literature: Examining Plagiarism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Shanghai in the 1930s

Gong Zhen

Summary: In the 1930s, plagiarism incident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Shanghai.